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主編 / 郝春文

2018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通訊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主辦
首都師範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18

2018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2018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高田時雄 柴劍虹

策劃

郝春文

主編

陳大為

副主編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首都師範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7.上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2018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 郝春文主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325-8844-2

I. ①2… II. ①郝… III. ①敦煌學—叢刊 IV.
①K870.6-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100823 號

2018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郝春文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惠敦印務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6.25 插頁 4 字數 457,000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844-2

K·2488 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幹事名單：

中國：樊錦詩 郝春文 柴劍虹 榮新江 張先堂
鄭阿財(臺灣) 汪 娟(臺灣)

日本：高田時雄 荒見泰史 岩尾一史

法國：戴 仁

英國：吳芳思 高奕睿

俄羅斯：波波娃

美國：梅維恒 太史文

德國：茨 木

哈薩克斯坦：克拉拉·哈菲佐娃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網頁：

<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ILCDS/>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秘書處地址：

日本國 京都市 左京區北白川東小倉町 47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高田時雄教授 Tel:075 - 753 - 6993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KYOTO 606 - 8265, JAPAN

目 錄

學術綜述

2017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1)

2017 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 范英傑 陳 焱(23)

百年敦煌碑銘讚研究綜述 陳 焱 范英傑(84)

敦煌慕容氏家族研究綜述 周倩倩(117)

敦煌五臺山文獻與圖像研究綜述 趙曉星(126)

2016 年西夏學研究綜述 韓樹偉(140)

2017 年西夏學研究綜述 韓樹偉(161)

會議介紹

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與長安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2017 年理事會綜述 石建剛(179)

傳承與創新的盛會

——“紀念段文傑先生誕辰 100 週年敦煌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張先堂 李 國(197)

出版信息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卷修訂版說明 郝春文(211)

《絲綢之路研究集刊》創刊發行 楊冰華(116)

書評

《敦煌十六國至隋石窟藝術》評介 楊博皓(215)

論著目錄

2017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宋雪春	楊敬蘭(220)
2017 年吐魯番學研究論著目錄	范英傑	陳 焱(237)
2016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林生海	(271)
2017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林生海	(290)
日本學者三夷教相關論著目錄	林生海	(301)
2017 年度中國大陸敦煌學相關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目錄	胡耀飛	(314)
百年敦煌碑銘讚研究論著目錄	范英傑	陳 焱(329)
近四十年中國大陸十六國史博碩士學位論文目錄	魏軍剛	(371)
2016 年西夏學研究論著目錄	韓樹偉	(382)
2017 年西夏學研究論著目錄	韓樹偉	(400)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稿約		(415)

2017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上海師範大學)

據不完全統計,2017 年度中國大陸出版的與敦煌學相關的學術專著有 40 餘部,公開發表的研究論文亦有 300 多篇。茲分概說、歷史地理、社會文化、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古籍、科技、書評與學術動態等十二個專題擇要介紹如下。

一、概 說

本年度有關“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莫高窟歷史記憶、敦煌歷史人物和事件考述、敦煌文獻的釋錄與刊佈等研究成果較為突出。

關於“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的研究:1942 年 6 月至 1943 年 5 月間“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在敦煌進行石窟內容調查、壁畫臨摹、照片拍攝、購買文物等活動。王慧慧《“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在敦煌考察時間考》(《敦煌研究》3 期)主要考證了考察團至敦煌的時間、在此考察的成員及其活動,糾正了一些回憶錄、口述歷史的錯誤。1991 年,王子雲家屬向敦煌研究院捐贈當年繪製的崖面全景圖 1 幅;2000 年又捐贈壁畫臨品 41 幅、西北寫生 5 幅、1953 年拍攝的新疆石窟照片 168 張;另藏有 1953 年王子雲臨摹的克孜爾壁畫 2 幅。梁旭澍、王海雲、盛岩海《敦煌研究院藏王子雲、何正璜夫婦敦煌資料目錄》(《敦煌研究》3 期)對其中 44 件敦煌、克孜爾石窟資料和 5 幅西北寫生資料進行了整理。經崇儀著,王平先譯《照片檔案遺產:敦煌、探險照片與羅氏檔案》(《敦煌研究》2 期)首先簡要概述了該檔案本身,包括羅寄梅的資料與拍攝方法的自然特徵,將該檔案定位為探險與紀實攝影的實例,並突出其對於歷史、文化與藝術研究的重要意義,然後在此基礎上考察了羅氏檔案對敦煌藝術研究的貢獻。孫志軍《1907—1949 年的莫高窟攝影》(《敦煌研究》2 期)通過對歷史研究資料、調查報告、公函、畫冊、回憶錄等資料的研究,全面梳理了晚清至民國時期在莫高窟發生的成規模的攝影活動。車守同《由〈吳忠信日記〉再探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時代背景》(《敦煌研究》2 期)就近三年來臺灣地區所公佈的《吳忠信日記》等新史料,補充說明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的時代背景。

敦煌莫高窟所在地宕泉河流域自漢代開發以來就有人類活動,西晉時建仙岩寺。馬德《莫高窟前史新探——宕泉河流域漢晉遺跡的歷史意義》(《敦

煌研究》2 期)認為,作為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築,仙岩寺見證了佛教從印度和中亞傳入中國的歷史;作為歷史上敦煌菩薩竺法護從事大乘佛教經典翻譯的場所,它稱得上是中國大乘佛教的發祥地;同時作為中國最早的習禪場所,它也是敦煌高僧曇猷在竺法護譯出禪經的前提下“依教修心,終成勝業”的歷史見證。敦煌地區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和緩衝地帶,也是農業文明與牧業文明不斷碰撞的地區。段小強、陳亞軍《敦煌地區史前文化初步研究》(《敦煌學輯刊》4 期)認為,敦煌地區的史前文化包括新石器時代文化、過渡類型、四壩文化、駝馬文化等。敦煌地區史前時期的生業經濟較為複雜,既有相對穩定的農業,也有靈活適應環境的畜牧業;四壩文化之前以農業為主,生產方式較為粗放;駝馬文化時期以畜牧業為主,農業比重降低。

敦煌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考述方面:王楠《伯希和與清代官員學者的交往(1906—1909 年)》(《西域研究》4 期)研究表明,伯希和和中國學者共同開創了敦煌學,他與中國學者保持長久的私人關係和深入交流是他學術成功的重要因素。王冀青《伯希和 1909 年北京之行相關事件雜考》(《敦煌學輯刊》4 期)考察了 1909 年伯希和攜帶敦煌寫卷至北京的歷史事件,依據最新刊佈的幾條新資料,確定了北京學界於 10 月 4 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於 10 月 11 日離開北京等日期,確定了公宴參加者“賓主廿四人”中 19 人的姓名,並修正了以前的某些觀點。朱鳳玉《陳閻舊藏敦煌文獻題跋輯錄與研究》(《敦煌研究》1 期)就所得見 14 件寫卷中存有陳閻題跋者,逐一輯錄,析論其涉及的相關問題,提供敦煌寫卷聚散研究、敦煌寫卷辨偽研究及敦煌寫卷斷代研究之參考。王冀青《英藏敦煌漢文文獻“蔣孝琬目錄”編纂始末》(《敦煌研究》4 期)根據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日記、賬簿等原始檔案資料,對斯坦因秘書蔣孝琬於 1908 年在新疆和闐為斯坦因所獲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 1318 件漢文文獻編寫紙條目錄的全過程進行了詳盡的研究,認為“蔣孝琬目錄”是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的第一個目錄,也是中國人最早為敦煌文獻編寫的目錄。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和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共保存斯坦因和奧登堡通信 27 封(含炭紙影印件 10 封),鄭麗穎《俄藏斯坦因致奧登堡信件研究》(《敦煌學輯刊》4 期)認為信件真實地反映了奧登堡和斯坦因的相識、通信開始、見面、頻繁通信、隨後通信的過程,部分信件對研究俄藏英藏文獻具有較為珍貴的史料價值。

和往年一樣,敦煌文獻的整理、釋錄與刊佈在本年度取得新的推進和成果。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十五卷於 2017 年 8 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該著釋錄了《英藏敦煌文獻》第四、五卷所收寫本 S.3005—3330 號,並對每一件文書的定名、定性和寫本形態、研究狀況等給予

介紹和說明。方廣錫、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本年度出版了第 41 至 50 冊,收錄編號為 S.02434—S.02770。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 21 冊,著錄編號為 P.T.1426—P.T.1451。郝春文主編《2017 年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刊發了敦煌學相關研究綜述、學術論文,並有 2016 年的學術會議介紹及新書出版信息;刊發了與學術綜述相關的書目如 2016 年敦煌學、吐魯番學研究目錄等。于華剛主編《世界民間藏中國敦煌文獻(第二輯)》(中國書店)對民間收藏且經過敦煌學家辨偽的敦煌文書進行了收錄,對所收文書的時代、內容、長度、紙張、殘損情況以及品相、裝裱、版本特徵等諸多細節都做了詳細的描述,通過彩色原大影印,逼真地再現了敦煌文書的真實原貌,凸顯了其珍貴的文獻價值、文化價值和文物價值。

榮新江《絲綢之路也是一條“寫本之路”》(《文史》2 期)提出,在絲綢之路上旅行需要有各種寫本文書的支持,這包括旅行需要申請公驗與過所、行前要準備旅行指南類書籍和會話練習簿、旅行中商人需要記賬、各種旅行者需要記事、買賣要訂立契約、旅途中需要書信往來溝通,有些求法僧要寫巡禮記錄、文人則要寫作詩文等,因此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一條“寫本之路”。劉進寶《東方學背景下的敦煌學》(《敦煌研究》3 期)探討敦煌學出現的背景,即當時國際學術的潮流是東方學,而東方學又是在西方對東方的侵略或佔領下逐漸形成的一門學科,具有殖民主義的成分。雖然東方學是殖民主義的產物,敦煌學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為提出時的背景而否認其科學價值。

二、歷史地理

本年度有關敦煌史地的著作主要有馮培紅《敦煌學與五涼史論稿》(浙江大學出版社),涉及歸義軍制度、敦煌大族、粟特人與五涼史等方面,反映了作者近十年在敦煌學、五涼史領域的代表性成果,也展現了作者的學術轉變軌跡。

2013 年,學者們利用遙感手段又在古瓜、沙二州新發現了 5 座古城廢墟遺跡。李并成《瓜州新發現的幾座古城址的調查與考證》(《敦煌研究》5 期)即對這些新發現的古城址做了調查與考證,對其歷史面貌有所助益。孫寧《“瓜州今敦煌”地理認識的形成——以〈左傳〉相關注解為中心》(《敦煌研究》5 期)對《左傳》“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紀事中“瓜州今敦煌”的注解作了知識史考察,並以此為中心,對“敦煌古瓜州”“沙州古瓜州”“瓜州是敦煌亦是沙州”等諸多認識進行了梳理。

政治方面：楊寶玉《〈張淮深墓誌銘〉與張淮深被害事件再探》（《敦煌研究》2 期）主要根據法藏敦煌文書 P.2913V《張淮深墓誌銘》及從非常著名的《張淮深碑》抄件（S.6161A+S.3329+S.141564+S.6161B+S.6973+P.2762）卷背詩文中新找到的相關記述，對這些文書及其折射的歸義軍史諸問題進行了辨析、考證。鄭怡楠《新出〈唐敦煌張淮澄墓誌銘並序〉考釋》（《敦煌學輯刊》1 期）考知張孝嵩任北庭節度使當在開元六年五月或者開元七年十月之後，開元十二年其遷任太原尹；張議潮之兄張議潭去世當在咸通元年；張議潮在咸通九年七月之後到十三年稱司徒。王慶衛《新出唐代張淮澄墓誌所見歸義軍史事考》（《敦煌學輯刊》1 期）通過《張淮澄墓誌》記載可知張議潭的卒年在咸通元年二月至十二月間，張議潮使用“司空”稱號至少至張淮澄去世之時，這為理解張氏歸義軍與中央政府之間複雜的關係，以及歸義軍政權內部的政治格局提供了新的視角。陳國燦《試論吐蕃佔領敦煌後期的鼠年改革——敦煌“永壽寺文書”研究》（《敦煌研究》3 期）通過敦煌永壽寺系列文書，推測此年吐蕃統治當局曾下令民間契約一律用吐蕃文書寫，同時下令收回佛教信眾供養給佛寺的所有農田、草地、林苑，重新分配給百姓為口分地，這是其統治晚期鼠年的又一次變革。此次變革的社會效果有限，其產生的社會民族矛盾激化，導致了吐蕃在敦煌統治的覆滅。李宗俊《晚唐張議潮入朝事暨歸義軍與唃廝囉的涼州之爭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誌及敦煌文書張議潮奏表為中心》（《敦煌研究》4 期）認為由李行素墓誌可知沙州歸義軍政權曾長期致力於控制涼州。咸通八年在朝廷的斡旋之下，歸義軍被迫放棄涼州，涼州被唃廝囉部族控制。李行素這次單車西使說服張議潮奉笏入朝，實現了唐中央對歸義軍的羈縻控制，並通過分割涼州而實際削弱了歸義軍，進而利用唃廝囉勢力實現了掣肘和壓制歸義軍的目的。

鄭怡楠、鄭炳林《敦煌寫本〈曹議金重修開元寺功德記〉考釋》（《敦煌學輯刊》2 期）一文，由 S.8659《曹議金重修開元寺功德記》結合 P.3875 號背面的《丙子年修造及諸處伐木油面粟等破曆》，可知重修開元寺工程 916 年開工，長興年間完成，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的長兄都押衙曹良才和右馬步都押衙張保山等都參與工程的建設，這項工程的建設目的就是為歸義軍節度使同中原王朝特別是後唐建立隸屬關係服務。楊寶玉《法藏敦煌文書 P.2942 與唐代宗時期的肅州史事》（《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對法藏敦煌文書 P.2942 所反映唐代宗時期肅州史事的幾個細節問題進行了研究。游自勇、鄧雯玥《敦煌寫本 S.2506V 等唐代〈佚名史書〉再探》（《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對敦煌寫本 S.2506V 等唐代《佚名史書》中前人未能考訂或考訂不周的史事重新作了討論，還對寫本的成書背景、成書年代進行了新的探討，認為此篇大事紀成書於

德宗貞元時期，抄寫的年代上限是憲宗初年，可能是轉抄中原傳入的史書。孟憲實《略論唐朝魚符之制》（《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利用傳世資料和出土魚符、龜符等文物資料，對唐代符制所反映的軍事制度變化以及蕃將問題進行了有益的討論。

王力平《八到十世紀的敦煌杜氏家族研究——兼及藏經洞文書的“偏向性”》（《敦煌學輯刊》2 期）指出，8 至 10 世紀杜氏一族在敦煌政教兩界表現活躍，藏經洞文書中的杜氏“痕跡”，也有助於對藏經洞文書“偏向性”的探討。陳光文《元代諸王出鎮敦煌相關問題新探》（《敦煌學輯刊》2 期）指出，元代在敦煌地區設立沙州路總管府，並以瓜州為其屬州；同時派諸王進行出鎮，建立起統治敦煌的軍政管理體系。S.663、S.5957 文書中的“國太”夫人索氏，反映出曹氏歸義軍初期與甘州回鶻之間的複雜關係。杜海《敦煌文書中的“國太”夫人考》（《敦煌學輯刊》3 期）研究認為，BD09015V、S.4537、P.2855、S.1398V 等文書中的“國太”夫人是曹元忠的夫人翟氏，在其子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稱太保時期（976—980），敦煌文書中開始稱翟氏夫人為“國太”夫人。980 年，宋朝敕封翟氏夫人為“秦國太夫人”，但是翟氏夫人在敦煌文書中使用的是“國太涼國夫人”稱號。S.4306 文書中的“國太公主”是曹元忠的于闐公主夫人，“國太公主”的使用是在曹延祿任歸義軍節度使時期。

經濟方面：郝二旭《唐五代敦煌柴草消費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敦煌學輯刊》3 期）從藏經洞出土的敦煌文書所記載的內容出發，通過對這一時期不同階段柴價的分析，結合稅柴徵收的具體情況，得出了敦煌地區天然植被受到嚴重破壞的結論。高天霞《從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看唐代敦煌地區的主要農作物種植》（《農業考古》3 期）認為唐代敦煌地區的主要農作物種植有以下特點：其一，唐代敦煌一帶綠洲農業所依賴的自然條件較好，曾種植有多個品種的稻類作物及芝麻；其二，在糧食作物中，粟和小麥是最重要的主食來源；其三，黍類作物品種多樣，它們與蕎麥、青稞、豆類作物等一起，在為人們提供身體必需之營養的同時，也豐富了人們的膳食結構。王樂《魏唐時期敦煌吐魯番地區的綾織物》（《敦煌學輯刊》2 期）研究認為，綾在西北地方的用途非常廣泛，常用於製作服飾和日常用品，在敦煌地區還大量用於製作寺院法器以及作為財禮、吊禮、賀禮和社邑成員身亡納贈的物品。在唐王朝統治西州時期，粟特人大量聚集於吐魯番，他們依靠穩定的社會環境、良好的語言優勢，在西州地區立足並從事商業活動。張重洲《唐代西州粟特人貿易活動考察》（《敦煌學輯刊》4 期）認為西州粟特人貿易活動主要分為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兩種，官方貿易包括入貢貿易和互市貿易，而民間貿易種類繁多。

三、社會文化

本年度有關社會文化的成果涉及學校教育、婚喪儀式、宅地的空間佈局、倫理關係等多個方面。趙貞《敦煌文獻與唐代社會文化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分律令制度、社會經濟、學術與教育、占卜與曆日四編,涉及唐尚書六部二十四格初探、敦煌出土文書所見唐代度牒的申領與發放、敦煌吐魯番文書所見唐代“三賈均市”的製作與實踐等研究。

趙和平《奠雁——兩千年婚禮儀式的變與不變》(《敦煌研究》5期)從梳理奠雁禮節的文獻記載及其形成過程入手,將傳世典籍、敦煌文獻、敦煌壁畫中的奠雁圖以及生物學上雁的自然屬性結合起來相互印證,揭示了奠雁這一傳統習俗所具有的社會學意義以及奠雁在中國古代婚禮中起到的文化符號作用。劉傳啓《敦煌喪葬文書輯注》(巴蜀書社)把敦煌喪葬文書輯為七大類:遺囑類文書、社邑喪葬互助文書、為亡人捨施疏、追念設供請僧疏、陰陽類葬書、喪葬書儀、祭文,每一類又按寫卷整卷或整篇校錄。每卷或每篇後加以題解,主要內容為描述原卷之形貌,包括正反兩面除了所錄之文外的其他未錄文字、卷面殘損、字體如何等。許飛《論吐魯番隨葬衣物疏中的“海東頭、海西壁”》(《敦煌研究》6期)指出,南北朝時期的買地券的製作者為了避免鬼神煩擾,在落款處常使用替身,並且有的同時給替身一個無法找到的去處。衣物疏作者也使用替身,而且替身有的與買地券相同,因而這句話實際是指替身——張堅固、李定度的去處。劉傳啓《“勸孝”與敦煌喪儀》(《敦煌學輯刊》4期)研究認為,敦煌地區“勸孝”儀式上多講唱十恩德、父母恩重贊、孝順樂、行孝文、勸善文、董永變、舜子變、目連變等孝敬父母為主題的作品,另外五會念佛贊文、佛本生故事太子故事,以及歷史故事、民間傳說等也是勸孝儀式上常見的講唱內容。

徐秀玲《隋唐五代宋初雇傭契約研究:以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契約的性質及發生原因、雇價、雇傭雙方的權利與義務、違約賠償、女性擔保人等方面進行分析,詮釋隋唐至宋初雇傭契約的發展變化,以及某些契約反映的其自身與當局者的政治決策,社會經濟狀況、生產生活、交通運輸以及人口遷徙之間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李正宇《公平形式掩蓋下的不公平——敦煌契約別議》(《敦煌研究》3期)通過對敦煌文獻S.6829V、S.6537V、P.3155V、P.3964等敦煌契約文書分析,發現其中就有一些很不公平的約定,作者稱之為“公平形式掩蓋下的不公平”。宋翔《唐五代時期敦煌城外園宅地的空間佈局》(《敦煌研究》6期)利用敦煌文書和壁畫,結合傳世史籍,對唐五代敦煌百姓城外園宅地的空間佈局進行了復原,揭示出

百姓所擁有土地規模的大小是影響園宅地空間佈局的重要因素。薛艷麗、王祥偉《敦煌文書 S.4657 與 BD09282 釋錄研究》(《敦煌研究》4 期)指出,敦煌文書 S.4657 和 BD09282 是兩件寺院會計文書殘卷,二者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多條賬目完全一致。從所載人物等信息及與相關敦煌文書比較可知,二者同屬公元 978 年前後報恩寺的會計文書。買小英《身體力行與躬行實踐——敦煌文書所見中古兄弟間的倫理關係》(《敦煌研究》4 期)發現敦煌文書中留存有諸多反映古代敦煌地區家庭中兄弟姊妹關係的契約文書、經濟文書以及願文和題記等,從中可以看出該地區兄弟間在處理家庭和社會關係時所秉持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足證中古敦煌地區的兄弟關係深受中國儒家倫理思想和佛教倫理思想的雙重作用,反映出平等互助、兄友弟恭的倫常關係和道德精髓,體現了對道德原則的“身體力行”和“躬行實踐”。

四、宗 教

本年度宗教研究的相關成果主要涉及佛教和道教。王招國(定源)《佛教文獻論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收錄了作者近年來撰寫的十四篇論文,所研究的文獻種類有敦煌遺書、日本古寫經以及一些珍稀刻本。每篇論文均從文獻學的角度進行論述,內容包括考訂文獻作者、追溯版本源流、分析文本系統、評述文獻價值等方面。

概說方面:方廣錫《一條達摩入華的另類資料》(《敦煌研究》5 期)對敦煌遺書中發現的 8 世紀上半葉寫本《成唯識論述記解前雜敍》(擬)進行探討,指出當時僧人“譏謗”達摩的方法之一,可能是質疑達摩傳法的合法性,或許正因為有類似的質疑,達摩不得不以“教外別傳”應之,並為早期禪宗的傳法特點提供了一個新的解讀視角。王邦維《再談敦煌寫卷 P.2001 號:學術史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書名》(《清華大學學報》5 期)根據伯希和當年在敦煌藏經洞“覓寶”時所作的日記和筆記,結合其學術經歷和背景進行討論,認為伯希和此舉並非偶然,而是與當時英國、法國乃至歐洲的東方學學術研究和學術史密切相關。方廣錫《隋唐敦煌漢傳佛教的宗派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6 期)考慮到“宗派”一詞在宋以前的文獻中最多出現過三次,認為宗派佛教在隋唐敦煌佛教中究竟處於什麼地位、是否主流、與佛教信仰是什麼關係,都成了敦煌遺書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問題。徐鍵《吐蕃高僧吳法成生平三題》(《敦煌學輯刊》1 期)詳細考證了法成在河西的三段經歷的時間及其往返沙州與甘州的原因,推定法成當卒於 861 年 3 月至 862 年 6 月間,最後判斷法成在 813—842 年間確實擔任過都僧統一職。

湛如《居家律範——從 P.2984V 看敦煌的檀越戒儀形態》(《敦煌研究》1

期)以 P.2984V 號卷子爲中心,對其內容進行考察分析:首先從卷子的戒律排序上,說明該戒律的主要受戒對象;其次以該卷的五戒儀軌爲底本對照其他卷子的受戒形式,分析其差異;最後從受戒時間、內容上分析受戒儀軌存在差異的原因,以期從側面反映當時敦煌的戒律生活。董大學《論唐代〈金剛經〉信仰之儀式化傾向——以敦煌文獻爲中心的考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 期)通過對敦煌遺書等出土文獻中《金剛經》及其相關的資料的梳理,發現《金剛經》信仰存在儀式化傾向,而且此種傾向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中後期。王晶波、朱國立《從敦煌本佛教靈驗記看佛教的傳播技巧》(《敦煌學輯刊》2 期)指出,佛教弘法者針對不同階層的受衆採取了“分衆傳播”的策略。敦煌本佛教靈驗記恰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傳佈佛法的“宣傳案例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佛教傳播的原貌,見證了佛教的傳播過程。

佛教文獻的綴合研究,本年度依然取得穩步的推進。張小艷《敦煌疑偽經六種殘卷綴合研究》(《文獻》1 期)通過對這六部疑偽經在敦煌文獻中現存面貌的考察,弄清其所存卷號、完整或殘缺的情況;並從內容接續、殘字拼合、行款相同、字跡與書風相近等角度的比較分析,將這六經中的 25 號殘卷(片)綴合爲 12 組。景盛軒、陳琳《英藏敦煌〈大般涅槃經〉殘卷初步綴合》(《敦煌研究》3 期)以英藏《大般涅槃經》22 號殘卷爲中心,通過對內容、裂痕、行款、書風、字形等方面的比較分析,把它們與同館藏和國圖藏、法藏、俄藏殘卷綴合爲 19 組。張炎《敦煌佛經殘卷的綴合與定名——以〈妙法蓮華經〉爲例》(《敦煌研究》5 期)通過全面普查目前已公佈的敦煌文獻,將其中 39 號《妙法蓮華經》綴合爲 10 組,以示綴合對於敦煌佛經殘卷定名之作用。張涌泉、劉明《敦煌本〈佛說大乘稻芊經〉及其注疏殘卷綴合研究》(《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 期)通過對內容、殘字、行款、書風、筆跡等方面的對比分析,將其中 19 號殘卷或殘片綴合爲 8 組,以期還原敦煌寫本的最初面貌,爲進一步整理研究打下基礎。張涌泉、徐鍵《濱田德海舊藏敦煌殘卷兩種研究》(《浙江社會科學》3 期)指出伍倫 36 號《瑜伽師地論》殘卷、伍倫 1 號《妙法蓮華經》殘卷可以分別與北敦 14734 號、杏雨書屋藏羽 538 號殘卷綴合,這些殘卷乃同一寫卷所撕裂,糾正了殘卷定名及其性質判斷中存在的問題,並進而對濱田藏卷的真偽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羅慕君《〈俄藏敦煌文獻〉未定名〈金剛經〉殘片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對《俄藏敦煌文獻》第 11—17 冊中 474 號未定名《金剛經》殘片進行了考辨,依照譯本系統進行了分類整理,並完成了其中 100 號殘片的綴合工作,爲全面、系統地整理敦煌本《金剛經》提供了基礎。徐浩、張涌泉《〈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誤綴四題》(《文獻》1 期)選取《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已綴合的 93 組《大般若經》寫本爲考察對象,從內容、行款、殘

字、書風、書跡等方面加以綜合檢驗，將《國圖》誤綴的五組歸納為四類，揭示誤綴的原因，並就敦煌殘卷綴合的方法作了簡要的評述。

密教研究方面：趙曉星《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密教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整理了與吐蕃佔領時期敦煌密教有關的大量文獻與圖像資料，對吐蕃時期的敦煌密教進行了一次系統研究。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以敦煌文獻與圖像為中心的綜合研究，下篇是以莫高窟第 361 窟為中心的石窟個案研究。趙曉星、勘措吉、萬瑪項傑《敦煌本〈六門陀羅尼經〉研究——中唐敦煌密教文獻研究之四》（《敦煌研究》5 期）指出，敦煌本《六門陀羅尼經》中的漢譯本存在傳世本沒有收錄的新版本，古藏文的兩個版本亦與傳世本存在差別。三階教方面：楊學勇《三階教化度寺無盡藏機構的管理與運轉》（《敦煌學輯刊》3 期）指出，三階教對無盡藏財物的施捨、運轉都有明確的規定，從其行為來看應該不是出息、放貸機構，而是慈善機構，但某些寺院的放貸行為也給化度寺無盡藏貼上了出息放貸的標籤。化度寺無盡藏的雄厚財富引起了政府的不安，其慈善事業又與政府意圖相背，進而引起政府的猜忌，故而在唐玄宗的強力禁斷下始絕其跡。

寺院與世俗社會的關係方面：陳大為、陳卿《敦煌金光明寺與世俗社會關係》（《敦煌研究》5 期）從金光明寺僧人家族背景、敦煌佛教信眾法會與抄經活動、金光明寺寺學教育、雙方經濟往來等方面探討了敦煌金光明寺與世俗社會的關係，指出唐五代宋初的金光明寺已經完全融入了敦煌世俗社會，與敦煌地區各階層民眾關係密切，儼然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經典的詮釋和解讀方面：韓傳強《敦煌寫本〈圓明論〉錄校與研究》（《敦煌研究》6 期）以現存敦煌本《圓明論》諸寫卷錄校為基礎，並基於《圓明論》寫本與校本的梳理而展開討論，以期對《圓明論》寫本分類、內容解讀以及歸屬判釋作深入研究。史經鵬《敦煌遺書地論學派〈涅槃經疏〉（擬）中的佛性思想——以 BD2224、BD2316、BD2276 為中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7 期）指出，《涅槃經疏》（擬）提出了既非本有、亦非始有的佛性論，即佛性在眾生修行的性種性階段纔出現，通過主體與佛性的互動，保障眾生提昇修行，以至解脫。廬芳玉、薩仁高娃《〈大唐三藏聖教序〉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利用石刻資料和敦煌寫本對唐太宗《大唐三藏聖教序》和太子李治《皇太子臣述聖記》的產生及其流變進行了討論。錢光勝《敦煌寫卷〈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與唐五代的刺血寫經》（《敦煌研究》6 期）指出，牛肅志怪傳奇集《紀聞》中“屈突仲任”的故事以及敦煌老人刺血寫經的題記，顯示出刺血寫經在佛教地獄信仰背景下在庶民間的轉變，可視為佛教中土化、世俗化歷程

中的一個側影，故敦煌寫卷《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具有重要的宗教思想史文獻價值。

道教研究方面：路旻、劉永明《從敦煌本〈度人經〉及南齊嚴東注本看道教天界觀的形成》（《敦煌學輯刊》1 期），通過對敦煌本《度人經》中天界觀的考察，指出它是第一部完整、詳細地將“十方（天）”“三十二天”“三界”等觀念融合在一起的經典，它既延續了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又開闢了道教全新的天界觀。郇同麟《〈天尊說隨願往生罪福報對次說預修科文妙經〉初探》（《敦煌研究》6 期）指出，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天尊說隨願往生罪福報對次說預修科文妙經》與《正統道藏》所收《太上慈悲九幽拔罪懺》部分內容相近，後者當據前者改造、拼接，並增加天尊名等雜湊而成。這一組道經的共同源頭則是《佛說灌頂經》卷一一和卷一二。劉屹《古靈寶經出世歷程之我見》（《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對古靈寶經形成的大體歷程進行了勾勒，並為幾乎每一部靈寶經找到了現在看來適合的出世時間，完成了古靈寶經的斷代問題，進而論證了其所提出的古靈寶經出世歷程的基本看法，即“新經”的造作時間早於“舊經”；“新經”和“舊經”內部又各有造作先後之分。趙洋《新見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道經敍錄》（《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對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道經文獻《赤書真文》《度人經》《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定志通微經》《十戒經》《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玉京玄都大獻經》《洞淵神咒經》《昇玄內教經》《本際經》和《無上內秘真藏經》等進行了敍錄。

五、語 言 文 字

本年度有關敦煌語言文字研究的成果相對少出，主要有：鄧文寬《敦煌文獻詞語零拾》（《敦煌研究》4 期）利用唐五代西北方音和一些方言俚語，對前人的校勘工作或提出不同見解，或提供新的佐證，力求找出原文獻的真實含義，並闡釋產生文字互代的原因。鄧文寬《敦煌本〈開蒙要訓〉三農具解析》（《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對《開蒙要訓》“杈杷挑撥，杵策聚散”中出現的“杈”“杷”“杵”三種農具之形狀和功用進行了解析，並對學界在此句字詞認識上的偏差進行了訂正。張小艷《〈敦煌醫藥文獻真跡釋錄〉校讀記》（《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對袁仁智、潘文《敦煌醫藥文獻真跡釋錄》在錄文、校勘、注釋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最終撰成 31 條校讀記，為該書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提供了支持。陳曉強《論敦煌文獻中的“塹”》（《敦煌研究》6 期）在考察今日敦煌地區製塹、用塹法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文獻考釋了敦煌文獻中的“沙

塹”“脱塹”“踏塹”“般塹”“易塹”“塹地”等詞。

竇懷永《敦煌寫卷避諱字形遞變現象初論》(《敦煌吐魯番研究》十七卷)通過梳理“牒”字的避諱字形之遞變歷程和特點,並以津藝 060 號《咸亨二年沙州胡薩坊口戶牒》中“牒”之字形為例,揭示了古代避諱在敦煌寫卷相關時間信息判定方面的功能。

宗教經典的字義詮釋方面:張穎《敦煌佛經音義聲母演變的中古特色》(《敦煌學輯刊》3 期)指出,作為敦煌出土的文獻,佛經音義聲母在演變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西北方音的烙印。趙家棟《〈序聽迷詩所經〉疑難字詞考辨》(《敦煌研究》5 期)對《序聽迷詩所經》中“加”“薄合”“趺睹”“沐(沐)”“扞扞”“訖句”等字詞進行考辨。鄧強《唐五代西北方音見系開口二等演變考》(《敦煌研究》6 期)指出,敦煌文獻中有兩類特殊的別字異文反映出唐五代西北方音中見系開口二等字韻母產生-j 介音,聲母齶化,部分字聲母受-j 介音的影響有了進一步發展為舌面音的跡象。

六、文 學

有關敦煌文學的研究成果多集中於佛教文學的探究方面。鄭阿財《敦煌寫本〈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研究》(《敦煌研究》1 期)根據敦煌寫本 P.2680、P.3570、P.3727 等三件《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校錄文本,析論其情節敘事,通過與《續高僧傳·慧遠傳》對照,認為當時僧人於各種法會間選擇《高僧傳》中適當的高僧神異事跡,括其內容而撰寫因緣傳、因緣記,以備宣講參考之用。陽清《敦煌寫本殘卷〈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中的五言詩——兼論中世佛教行記的情感抒寫及其詩筆》(《清華大學學報》4 期)指出,中世佛教行記的情感抒寫及其詩筆,充分表現出晉唐高僧作為佛教徒、異鄉人以及旅行者的普遍情懷,特別昭示出唐代詩歌繁榮的時代現狀和積極意義,必然會對以後相關的佛教敘事尤其是西遊主題類小說產生重要影響。王晶波《從敦煌本〈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到〈金牛寶卷〉》(《敦煌學輯刊》3 期)依據中、韓所存相關文獻與壁畫材料,認為《金牛寶卷》與韓國《釋迦如來十地修行記·第七地》都是承接唐代《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而來,是該典籍在中國民間通俗演變的結果。喻忠傑《敦煌因緣與佛教戲劇關係考》(《敦煌學輯刊》1 期)認為,敦煌寫卷中用於表演的早期腳本的出現,從文本外觀和具體內容上進一步印證了後世戲劇與唐五代說唱伎藝之間的親緣關係,同時也印證了敦煌因緣與佛教戲劇之間存在因承關係的歷史事實。

唐人文集研究方面: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實》(《敦煌研究》1 期)從考實《帝京篇》的性質入手,通過考實作者範圍進而考實作者,